

跋涉集 (系列之三)

海青集

爱新觉罗氏张廷斌

穆鸿利 著

中国国际出版社

2011

跋涉集

系列之三

海青集

愛新覺羅氏鑒是齋

(女真满学论集)

穆鸿利 著

中国国际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凡
封面设计：沈 河
封面题籤：爱新觉罗·启骧

跋涉集·海青集 穆鸿利 著

出 版：中国国际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望角弥敦道 582 号
发 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 编：100011
印 刷：香港广益速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8
插 页：8
字 数：44 万字
印 数：1—500 册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88—97753—4—4/K·23

定 价：（平）全套定价 152.00 元 本册定价 46 元
 （精）全套定价 188.00 元 本册定价 56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海青集（女真满学论集）

女真语言文字编

- 一、女真语言文字概说 (1)
- 二、围绕女真文字研究的几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16)
- 三、《女真馆来文》的版本及其研究 (35)
- 四、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40)
- 五、女真大字造字人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 (47)
- 六、金朝开国史的丰碑女真族文化的瑰宝
——兼论“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历史价值 (69)
- 七、金代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女真字
考释 (77)
- 八、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
初释 (84)
- 九、从奥屯良弼女真文石刻看金代民族文字的
演变 (101)
- 十、谈阿尔泰语系女真语与满语之比较研究问题 (111)
- 十一、百余年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和畅想 (116)
- 十二、20 世纪末女真文研究的跨越与腾飞 (128)
- 十三、女真语与满语之比较研究 (132)
- 十四、《女真译语》开发应用的有益尝试* (154)

附录：

女真文字史料摘抄····· (158)

金源文化编

一、金源文化论纲····· (207)

二、金源女真的文化风习与民族刍议(提纲)····· (210)

三、论金代尊孔崇儒之风对女真文化突变的影响····· (212)

四、金源文学之明珠
——女真族著名诗人完颜珣及其作品····· (228)

五、女真教育史略····· (237)

六、女真科举制度史述略····· (247)

七、女真族的科学技术····· (257)

八、金元四大家都有谁?····· (266)

九、金代女真婚俗二则····· (280)

十、金源女真姓氏谱及改汉姓之分类与特点····· (284)

十一、走近阿城 感悟金源
——我与阿城廿余年未了的情结····· (306)

满族历史文化编

一、满族文化渊源初探····· (315)

二、试论女真满族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不可
分割性····· (329)

三、试论满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的几度辉煌
——为纪念满族命名 364 周年而作····· (335)

四、神武绝伦的天命汗努尔哈赤····· (363)

五、文韬武略兼备的天聪汗皇太极····· (372)

六、关于清前史的时限和学术定位问题····· (379)

七、关于建州女真与完颜金同源问题····· (386)

八、关于天命汗号的由来及“大金汗国”的国号
问题····· (392)

-
-
- 九、满族“颁金节”的来历
——兼谈满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398)
- 十、颁金盛会话海西女真辉发部
——纪念满族颁金节 366 周年…………… (404)
- 十一、“颁金”盛会话满族的传统美德
——兼谈满族的精神文明和革命斗争传统…………… (414)
- 十二、浅谈满族是个富于文化创造的民族…………… (432)
- 十三、当代满族文化名流辈出各领风骚
——为纪念满族“颁金节” 363 周年而作…………… (439)
- 十四、满洲·通古斯语各民族萨满祭祀比较…………… (464)
- 十五、跨世纪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475)
- 十六、《清朝野史总览》前言…………… (528)
- 十七、《沈水集》序…………… (535)
- 十八、诚挚祝贺 殷切期望
——热烈祝贺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540)
- 十九、怀念·景仰·继承
——沉痛悼念女真满学资深学者、一代大师金启琮先生…………… (546)

一、女真语言文字概说

一、女真语言及其演变

女真族是北方民族中比较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语言学界认为，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满语文，^①是有清一代满语的祖语，其语音大体与满语略同。即使有些不同，也有一定的音变规律可循，在语言词汇上与满语十同六、七，句法结构上也与满语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女真语又是契丹、蒙古、达斡尔等蒙古族诸语言的亲属语，在阿尔泰语系中，满洲·通古斯语族与蒙古语族更为接近。这从二者的音韵结构、形态特征和词汇的类似上，均可以明显地看出。尤其就词法形态而言，都属于粘着型。其特点是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词根或词干同附加成分的结合不紧密。

阿尔泰语系是我国北方民族语言中的重要语系。女真族的语言又是十分悠久的语言。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②斯大林也指出：“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自然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③可见，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直接受社会的制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女真语是女真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创造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语言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也将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汉文文献记载，远在女真先民肃慎、挹娄、勿吉时虽未创制过本民族的文字，但都已有自己的语言传承下来。肃慎氏“无文墨，以言语为约”。^④挹娄“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⑤而勿吉“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⑥唯靺鞨建渤海国时史载“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⑦不过这种文字，究竟是自己创制本民族文字，还是使用汉字，学界尚有分歧。而女真直系先民黑水靺鞨“俗无文字”^⑧则是明确的。五代辽时，女真初兴与契丹言语不通，且无文字。随着女真完额部统一女真各部后，与辽朝契丹人接触愈益频繁，女真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会了契丹语，有的人还精通了契丹大小字。阿骨打起兵反辽以前，为了掌握辽朝的实情，不仅他自己亲自出席辽帝所摆的头鱼宴，以了解辽朝虚实，而且曾先后派遣蒲家奴、习古乃、银术可、仆聃刺等善说契丹语的人，以索要叛逃的阿疎为名出使辽朝，说明在女真族中，懂得契丹语的人日渐增多。随着阿骨打起兵反辽不断胜利和统治区的扩大，俘获不少契丹人和汉人，于是女真人中通契丹语和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对女真语的发展，无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甚至丰富了女真语的词汇。不过，从总体上说，女真语的词汇仍十分简单而贫乏，表现在人名和称呼上就十分明显。诸如，不少人名叫“石鲁”、“阿鲁”，为了不致混淆，往往在名字前面加上“勇”字，称“勇石鲁”；或加上“贤”字，称“贤石鲁”。^⑨此外，女真人还常以某人的特点作为绰号，如乌古乃，由于他“饮啗过人”，被称为“活罗”（一种善啄物的鸟）。^⑩从流传下来的女真语口头文学歌谣中，也可以看出其内容和词法都很简单，“只不过是牛、马、生、死和人名一类的基本词”。^⑪据专家研究，这种情况可能与当时女真人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有关。

任何一种语言都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民族的变化而变化。金朝建立后，尤其是金的政治中

心从金源之地的上京（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燕京（北京）和汴京（河南开封）之后，凭借其政权力量一度使女真语的应用范围得以扩大。一方面，女真人中有更多的人学习汉语、穿汉服、甚至与汉人通婚，改汉性也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东北、华北一带的一些汉人，在习俗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也能说女真语，穿女真服装，习染女真风俗。世宗完颜雍时，南宋使臣韩元吉在汴京见到接待宋使的汉人能讲女真语，而且在装束上也有变化，便是明显的一例。对这种情况，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诗稿中就曾明确记载韩元吉在汴京上元驿中所见：“上元驿中槌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⑫而在这之前，范成大使金时，即已见到汴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⑬这里虽未明确指出语言，但是可以推想，当时中原汉人会说女真语者，绝不仅汴京一地。历史证明，语言向来是互相影响的，进入中原汉人地区的女真人也在不断地汉化，尤其是女真贵族中某些人最先开始学习汉语汉文。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章宗完颜璟都是大家熟知的汉化很深的帝王。完颜亶“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股，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⑭海陵王完颜亮汉文修养很深，能写得一手好诗，他“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有“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⑮之名句传世。章宗完颜璟在金代女真贵族中更是具有较高汉文化素养，其词风颇为纤巧绮丽，且学得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很有成就。

金亡以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由于同汉族人长期杂居，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大多改操汉语通汉文，而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在元、明两代仍有一些人说女真语，用女真字。不过，由于蒙古的统治，改习蒙古语和蒙古字的人，也不在少数。可见，女真族

人在长期与广大汉人和其它族人来往愈益密切的情况下，女真语言也在不断地吸收别族的语言成分，进而更加丰富了自己的语汇，完善其语法规则，在女真语中，包含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和其它族的语言词汇便是明证。

二、女真大小字的创制

女真人初无文字，早在完颜部著名酋长昭祖石鲁时，仍处在“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⑧的阶段。经过激烈斗争，遂“稍用条教”，但“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⑨由于女真人没有文字，各部之间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那时，女真社会内部“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⑩至景祖乌古乃时，接受辽朝册命为女真族节度使，有了官属，“纪纲渐立”，与辽朝交往，使用一种木制的“信牌”（亦叫木契）做为凭证。穆宗盈歌末年虽然统一了信牌，但是传递信息的具体内容，仍然要出使者口述之，即使像自幼聪敏善辩的肃宗颇刺淑，在他担任国相期间，常出使辽朝，当他“白事于辽官”^⑪时，由于“鄙陋无文”，便常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使听者为之“愕然”。^⑫阿骨打起兵反辽后，俘获了不少契丹人和汉人，于是女真人中“始通契丹汉字”者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精通契丹字的学者。其中比较有名的像完颜宗雄（谋良虎）“好学嗜书”^⑬他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尽通契丹大小字”。其它尚有完颜晏、完颜宗秀、纥石烈胡刺、乌古论蒲鲁虎、蒲察鼎寿、术鲁阿鲁罕等，也都能通识契丹字。金建国初期，凡国内政令、文书以及与邻国的外交往来，几乎无不借用契丹字。与辽朝交涉，由于没有本族文字，“凡军事当中覆而应密者，请将皆口授思忠（即褥盥温敦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答赞谋往来专

对其间，号闸刺（汉语云：行人）”^④直到天辅三年（1119）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册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干、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⑤。说明，直到女真字颁行前两个月，与辽国交往的文书，仍要译成契丹字。随着女真反辽节节胜利，金朝的政治形势飞速发展，女真族历史地位的急剧变化，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迫切需要提高女真族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文化水平，这就要求创制本族文字。金朝的建立是以女真完颜部统一女真其它各部做为基础的。历史说明，一个民族只有实现统一和建成它的统治中心，才有可能产生该民族的共同语。根据文字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文字的决定因素，应该包括：社会对文字的需要；语言特点的影响；先前的文字制度的影响；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等等。这几个因素，在金初均已具备。这样，女真文作为一种语言辅助工具和社会交往的手段，便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女真文字的产生，雄辩地说明了女真共同语的正式形成。

女真人的文字有大字和小字两种。金朝初年由完颜希尹与耶鲁共创女真大字。完颜希尹是金朝开国功臣，他在天辅二年（1118）受命与耶鲁（又译叶鲁）创制女真大字^⑥，对此《金史》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令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⑦自天辅二年二月以来，辽使耶律奴哥等前来议和，多次以国书来，金太祖命胡突袞多次如辽。八月，胡突袞还自辽，耶律奴哥、突迭复以国书来。在这频繁交往的情况下，九月，太祖下诏：“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充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⑧经考证，这段记载说明太祖开始选拔那些善属契丹、汉文的博学雄才之士，以组成造

女真字的班子，而完颜希尹和耶鲁便是主要的人选者。他们用了年时间，编定了《女真字书》。^⑥根据传世的女真大字进行研究，这种文字多是采用汉字和契丹字两种文字字形为基字而增减笔画制成。^⑦

女真字中确实有相当部分是以汉字为基字增减其笔划而制成女真字的意字和音字，常见的有：

天作𠂇 (abuxa)、	风整𠂇 (əbu)、
日作日 (inəŋgi)、	月作月 (bia)、
夏作夏 (bɜua)、	国作国 (guru)、
南作南 (fan)、	北作北 (uü)、
西作西 (furi)、	兄作克 (axu)、
弟作弟 (dou)、	一作一 (əmu)、
二作二 (dɜuwa)、	三作三 (ilan)、
六作六 (niŋgu)、	九作九 (ujewən)、
十作十 (dɜuwa)、	百作百 (taŋgu)。
万作方 (tumən)、	

这些字，一望便知，是由汉字增笔或稍加改笔而成，不过读音已非汉字原音，而是拼读女真语音。虽然笔划有变异，但其意义如故。

还有一些字，虽然改变了笔划，却读原来的音，并取其意。如：

京作京 (gün)、	府作府 (fu)、
何作何 (xə)、	其作其 (gi)、
犀作犀 (ri)、	大作天 (dai)、
太作太 (tai)、	五作五 (u)、
上作上 (ɕ aŋ)、	工作王 (guŋ)。

也还有一些字，是稍变字形，略改读音，接近原汉字的读音，但却未采其意。如：

茶作茶 (sa)、	雨作雨 (j)、
-----------	----------

赤作𠂔 (tū)、 志作𠂔 (d3a)、
 朱作𠂔 (d3ul)、 先作𠂔 (sira)、
 舍作舍 (sa)、 于作𠂔 (i)。

总之，以上所举例，不外两种情形；一为以汉字为基字，改其形，仍取其义，而读女真语音；一为以汉字为基字，变其形，采其音，而不取其义。当然，这只是女真文字构成的一部分。

另一些则是从契丹字来的。自从锦西契丹字（指《锦西肖孝忠墓志》契丹字，即契丹大字）发现以后，人们渐渐发现女真文字除部分地采用汉字作为基字而外，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契丹字做为基字而制成女真字的。这就使人联想到前引《希尹传》“因契丹字制度”的内在涵义了。锦西契丹字的制字制度，一般是以一字表示一个完整的意义，或者连接几个字以表示一个完整意义的办法。据专家研究，现在女真字中有些字，在锦西契丹字中就存在。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还有些字是由锦西契丹字加减笔划而成。诸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还有些从汉字演化来的女真字，在锦西契丹字中即有，说明契丹字在造字时，也依仿了汉字。比如前面曾提到过的女真字中就有：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等字

这些字，做为女真字，既可能是直接从汉字而来，也有可能是从契丹字而来。

此外，在女真字中，也有些字与庆陵契丹原文单字（指契丹小字）相似。诸如：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𠬞

虽然这些字在整个庆陵契丹字中所占比例很小，但是这种契丹小字在造字时，有可能是从契丹大字来的。总之，从以上所举例证中，可以说明女真大字的构成，既有从汉字而来，也有从契丹字而来，这是确定无疑的。

女真大字创制颁行后，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召耶鲁赴京师授女真字。后来熙宗又对女真字进行了改进，创制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1138）颁布，并于皇统五年（1145）“初用御制小字”。^⑧

女真语言文字概说（续）

女真文字的创制，前文已有所论述，现述女真文字的应用和流传以及十九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女真文的研究。

三、女真字的应用和流传

女真大、小字颁行后，很快便成为金朝官方的通用文字，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更为广泛地应用起来。

首先，用女真文撰写国书谕令和文诰。天眷元年（1138）九月，熙宗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⑨。说明女真字颁行初期，确已成为金朝官方通用文字，不过

要与契丹、汉字并行使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女真字主要通行于都城和女真族聚居地区，而对汉人包括渤海人使用汉字，契丹人仍采用契丹字，这样做显然有利于分而治之。

其次，设立女真字学校以教授女真字，培养女真族人材。为了扩大女真字的应用范围，以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金朝政治需要的女真官吏，提高女真人的文化水平，在金京城和各路设立学馆和学校，以教授女真语言文字。“初，丞相希尹制女真字，设学校，使讹离刺等教之。”^③此后，学习女真字的人进一步增多，遂从各路选拔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集中到京城学习。天会年间“选诸路女真字学生送京师。”^④最初学女真字的人多半是女真贵族子弟，即“良家子”，也称“有物力家子弟”，年龄较小，一般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大定十三年（1173）建立女真进士制度后，开始在中都（今北京）设立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又以新进士为教授。当时所设府、州学二十二处，计有：中都、上京、北京、西京、东京、胡里改、合懒、蒲与、恤品、婆速、咸州、泰州、临潢、冀州、开州、丰州、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等处。^⑤由于金朝对女真字学生待遇十分优厚，故学者人数很多，最多时学生人数达三千人之多。经过女真字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比较著名的女真字学者，诸如：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独吉义、孛术鲁阿鲁罕、徒单克宁、徒单铤等。这些人有的后来竟成为金朝有名的将相。

第三，立女真进士科，以升擢选官。为了选拔官吏，专门设立女真进士科进行考试，以是否会女真文来升擢选官。世宗完颜雍从大定十三年（1173）开始建立以策、诗取士的女真进士制度，以选拔女真进士。大定二十年规定以策、诗、赋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若有文采，量才任使”，由是“学者渐盛，转习经史，故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⑥

第四，译述汉文经典，传播先进文化。金朝统治者大多比较

注意吸收汉文化，女真字创制后，曾先后多次下令翻译汉文经典，包括经书和史书等大量汉文著作。大定四年（1164）世家诏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从大定五年起，先后译出《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汉书》、大定二十三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各家子书和史书。此外，还译有《伍子胥书》、《孙臯书》、《太公书》、《盘古书》、《黄氏女书》、《家语》、《百家姓》等等。特别是女真字译儒家经典《孝经》千部交给典检司分赐给护卫亲军，人手一册。

第五，女真字还应用于碑碣、符牌、铜印画押、铜镜边款和墨书题记上，其中以女真文碑刻最为重要。传世的金代碑刻以《大金得胜陀颂碑》（吉林省松原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现在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奥屯良弼饯饮碑》（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奥屯良弼诗碑》（发现于山东省蓬莱县）、《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发现于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子完颜希尹家族墓区）、《海龙摩崖石刻》（共二处，吉林省海龙杨树林乡）。在今朝鲜境内尚有《庆源郡女真国书碑》（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境内）、《北青女真国书摩崖》（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内）。明代的女真碑刻有珍贵的《永宁寺碑》（现藏俄罗斯远东海参崴博物馆）。上列碑刻中，以前两碑最具代表性，《大金得胜陀颂碑》字数最多至一千五百余字，且有汉文对照，此碑为金朝开国史的丰碑，女真文化的瑰宝，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最高。《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其书法字迹最工整，碑文共一千一百余字，全文对金代科举考试地点、年月及所试科目、论题诗题，试官衔名、录取经过以及进士名氏籍贯等均有记载，一些猛安之名，多为《金史》所未见，对补史之阙，以及研究金代科举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墨迹资料主要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女真字题壁、兴安盟科右中旗杜尔基墨书题字、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乡敖力斯台村以及索伦乡红光村南山女真墨书题壁等。

陕西碑林石台孝经内部发现的《女真字书》残页，是女真人的手迹。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女真字书抄本，对研究女真大字的创制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苏联俄斯达里科夫在列宁格勒博物馆发现了混在西夏文资料中的两页女真文手抄件，时间要晚于西安碑林所发现的女真字书抄本。

传世的女真文献，只有明朝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中女真馆编辑的《女真译语》，至为珍贵，是译释女真文的重要工具书。全书分为“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女真文语汇，包括女真字、汉文及汉字注音，共分十九门，计有女真单语八百多，分列于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饮食、衣服、珍宝、方隅、声音、数目、通用、续添、新增各门中。来文是移录当时女真各部（主要是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卫、所官吏向明朝进贡的表文，是以女真语汇依汉文语法堆砌而成，显系四夷馆人所代拟。存世的各种版本来文共七十九通。这些是学习和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也是比较珍贵的女真字资料，明代后期，会同馆又编辑一种《女真译语》仅写汉字译音，无女真文字，专为口译之用，但语汇较多，对研究女真语言文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朝人王世贞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正稿说部《宛委余编》中曾著录“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八个叠写的女真字译文。^④明万历年间，制墨家方于鲁所著《方氏墨谱》一书，在罗列墨锭图案中，有一图案也将这八个叠写的女真字译文放在图案当中，与上举《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所录完全相同。其叠写字为：

明	王	慎	德
倅	余	秃	束
卡	伐		
四	夷	咸	宾
卡	秀	伐	侑
	杀	甫	旦

这种书写特点与前述“国之信”牌上的字书写方式基本相